东方的重新定位 （有道翻译版）

国家的历史经常出现奇怪的转折。一个国家长期强烈反对的政策可能突然被热情地采纳，直到钟摆再次摆回原来的位置。因此，中国在尽了最大努力拒绝西方的影响之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特点——至少在主要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是这样;现在她又开始怀疑西方，在许多情况下，那些曾经领导中国走向西方的人并没有坚持要中国回归自己的传统。其中一位是代表东西方有趣结合的政治思想家江教授康湖教授。他的生平本身就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部分的特征。

江教授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官宦世家，他的祖辈三代都达到了“翰林”学者的地位。他在北京的父母家中接受了旧式的家教教育，在17岁时获得了中国三个著名学位中的前两个。由于旧的考试制度被废除，他从未获得过第三个学位，即“翰林”学位。斯彭迪纳在伯尔尼叛乱后到日本定居，成为新成立的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助理教授。他参加了一个教科书委员会，并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证明了他对西方教育的热情。

1914年至1920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中国历史。回国后，他第二次访问欧洲，在德国待了几个月，在俄罗斯待了一年半。回到中国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学院(Nanyang College)，该校北京分校有数千名学生。他经常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正当他在中国内地讲学时，中日冲突爆发。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努力为结束敌对状态作出贡献。他移居香港，并于1939年10月10日(“双十节”)同意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作，但不放弃他的独立立场。他现在是考试院的代理院长，并作为人事部长，南京政府成员。他还编辑月刊《民意》。—— K.M.

**重新定位**

十年前，当我在美国教书时，我创造了“重新定位”这个词。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在某个路线或方向上重新调整”;然而，它的真正内容是这样的。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模仿西方，其结果是她离自己的老路越来越远。今天，这种偏离已经发生了幸运的是，还没有发展得太远。但是，正如不幸中的人回忆起自己的起源一样，我们感到迫切需要决定一个新的方向，回到我们在世界上命中注定的位置，恢复我们历史过去的辉煌。中国是代表远东文化的国家。“方位”具有“东方”的基本含义，由于罗盘的四个点在古代是根据日出而固定的，东方形成了四个方向的主攻点，因而决定了方向。单词开头的音节“re”包含了“返回”、“更新”、“再次”或“重新”的所有含义。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新名词，旨在为中国的重建和进一步的进步提供一个指南针。

我清楚地记得，早在二十年前，当我提出中国要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复兴的思想时，我不得不忍受的指责和反对。我的反对者没有别的反对意见，只认为回到传统只能意味着倒车，因此是倒退而不是进步。我始终自由地主张，复辟很可能同时也是改革，这一点可以用东西方历史的例子来证明。明治时代的日本维新，本质上不就是皇权的复辟吗?再想想那道叫“文艺复兴”的灿烂光芒，照亮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在这两起事件中，“回归旧”都是口号，而实际的结果却是一场复兴。

**中国努力模仿西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统治着中国。这是怎么发生的呢?1910年和1911年，汉武帝统治的最后几年Kuang-hsü，同盟国的军队侵扰中国内地，外交和军事形势无望，政府和国家的经济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当时兴起了君主立宪制运动，被作为典范的国家是英国和日本。然而，君主立宪制从未建立。革命爆发，民主共和运动大行其道，以法国和美国为理想国家。革命虽然表面上完成了，但仍在继续。政府和军队仍然不负责任和腐败。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现在俄国成了被模仿的国家。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残酷活动和第三国际的邪恶计划，甚至使俄国的朋友也感到不安，并最终使他们成为俄国人的反对者，而那些起初容忍共产主义的人却转而反对共产主义，企图消灭共产主义。随着法西斯运动的出现，现在被视为一种模式的国家是意大利和德国。让我们考虑一下。君主立宪在英国和日本是成功的，在中国是失败的。民主可以在法国和美国盛行，但在中国却失败了。共产主义征服了俄国，但在中国却失败了。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是成功的，而它们在中国却没有成功。历史、国家、人民的不同，是一种政治形态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不一定会带来真正成功的原因，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中国实际上已经尝试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大国的政府形式。为什么自己国家的经验会被遗忘，为什么没有考虑它的倾向?毕竟四千年前，早在英、日、法、美、俄、意、德这些国家还没有政治意义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法律和文明。*如果我们现在在对其他国家进行了无果的研究之后，认为没有别的办法，认为我们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必须束手束脚地等待结局——这难道不是我们自我的投降吗，这难道不是表明了一种奴隶的本性吗?*

既然欧洲风俗随着海上交通的开端逐渐渗透到东方，原来对外国人在中国的盲目仇视变成了对他们卑躬屈膝。我们在伟大的商业活动中忘记了我们的祖先，我们每学会两步，就会忘记一步。*奴隶的态度愈演愈烈*，*而我们自己的品质也在继续衰退*。如果我们现在不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倒霉了。远东文化之流源远流长，但中国的源远流长最多。中国文化中包含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但孔子和老子的教义可以被认为是我们哲学的支点。具体地说，中国文化是我们看待所有其他国家的内外政策、经济和军事问题、宗教和习俗的基础。我们不应以客为主，不应以敬畏之心仰望西方的气息，不应机械地重复欧美的陈旧口号。

**西方思想:共产主义**

我将特别讨论从西方带到中国的两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是民主。

社会主义是当今概念洪流中的一个中心思想。从左到右，一切都随波逐流，一切都在与这种主导力量的关系中发生着变化。然而，由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正在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技术文明正在取得越来越大的进步，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明显，挣扎的下层阶级的苦难更加尖锐。因此，如果没有社会秩序的基本更新，就不存在任何重建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的混乱和红军人数的增加是最突出的现象。虽然我最坚决地反对共产党的不诚实的、秘密的、非法的、不人道的方法，如此献身于第三国际，但我仍然相信反对共产主义和抵抗红军，不应该只靠武力和政府的镇压手段。相反，一方面应该鼓励宽容的社会主义，这将吸引知识分子，而另一方面应该对腐朽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革，以拯救工人阶级。应该尽最大努力宣传现代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式资本主义具有新的、明智的基本原则，在所有措施上都是公正的。与此同时，应该处处揭露黑暗;应该通过询问来追查人民中的苦难，把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隐藏的苦难公布于众;痛苦的哀号和哭喊，要倾听;也应该唤醒富人和被宠坏的人的注意力。

**刺刀是不够的**

军事措施反对共产党人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蒋介石最近几年剿共团伙所取得的成果，以及目前沦陷区第八军和新四军的共产主义程度，很明显，军事措施不仅不够，而且实际上助长了共产主义的传播。这就证明，政治措施比单纯的军事措施更为重要。因为共产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论和组织，这些理论和组织的顺利而周密的运作，就像他们简单的训诫和指示一样，继续帮助他们赢得受骗的人民的支持和掌声。由此可见，他们更加重视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反共的人很难形成社会的基本改造计划，也很难看到社会的基本改造计划的实现。中国和日本还在遭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利影响，其不充分的社会改善方案几乎不值得认真考虑。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即理想主义方面必须比经济方面得到更多的重视。我认为，在对共产主义的精神抵抗中，有两种主要的武器，中国和日本也应该同样地加以利用。

**共产主义的两种答案**

1. 东方文化。中国和日本可以回顾四到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明在各方面都符合两国的性质。从古至今，两国关系只有发展而没有衰退，只有变化而没有破裂。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欧洲风俗逐渐渗透到东方，弯曲了人们的意志，诱使他们模仿。我们迷失了自己的老路，自取灭亡，这不过是我们怀疑自己所应得的惩罚。唯一的拯救之路就是重新增强我们的自信，致力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原始精神不动摇地持续下去，外来因素就无法渗透和腐化。幸运的是，中日两国文化的根基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这可以在形成这些文化的实际支柱中找到:佛教哲学，道教关于个人自我完善的教义，以及儒家关于人际关系、道德、政府和国家哲学的概念。驱逐舶来的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教义，构成了两个民族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精神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步。

（2）eo-Socialism“社会主义”这个词今天对中国和日本来说，仍然是一种魔咒。在我看来，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化的资本主义,比实际的资本主义发展了一些，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绝对对立面。因此，我所推荐的新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恩格斯的，也不是考茨基的，甚至不是列宁的，也不是斯大林的。我将它定义如下:

1. 资本的公社控制:即每一个营利企业都要完全由公社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成为资本家。
2. 劳动报酬: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将为他的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获得一定比例的工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成为工人。通过这些方式，阶级对比将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和剥削也将不可能发生。
3. 普遍提供教育和食物:也就是说，在教育方面要达到最大限度，在食物方面要保证最低限度。
4. 反过来，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让每个人都能得到教育，不让任何一个人受到照顾。这将确保所有人的身心得到营养。当同样的可能性向所有人开放时，现有的差异完全是天赋和勤奋不平等的结果，就不再有必要责怪老天或人类了。

反过来，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要照顾到每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被忽视。这将确保所有人的身心得到营养。当同样的可能性向所有人开放时，现有的差异完全是天赋和勤奋不平等的结果，就不再有必要责怪老天或人类了。

有了这种新的教导和新的秩序，两国的国民经济就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了这种变化，繁荣将进入两国人民的生活，生产将增加，精神动力和更大的工作能力是可以预期的，而红色激越将不再有立足之地。

这是两国反对共产主义的精神斗争迈出的第二大步。这两项措施，一旧一新，一保守一进步，一点也不对立但实际上是互补的。因为东方文化一直包含着这样一种社会观念，即四海之内的人是一家人，这个家庭本身就足够了，这是孔子关于宇宙和谐的话语。

**西方思想:议会制**

19世纪可以被看作是民主的黄金时代。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8世纪，它的威望到20世纪还没有完全消失。“民主”这个词听起来很新，但在中国古代，以及古希腊和罗马，都有类似精神的政治制度和表现。然而，19世纪的民主有其与过去不同的特点:选举、人民代表和议会——这些所谓的政府间接参与的机构，使任何规模和人口的国家都能实现民主的理念。

至于结果，其缺陷可以数不胜数。间接性的衡量已经发展到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代表和被代表，不仅彼此没有联系，甚至相互对立。逐渐演变为少数人获得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而多数人被忽视，或者少数人抢夺领导权而多数人盲目追随。很快，政治机器停止运转，工作能力下降，政府的组织松散，腐败进入。然后，民主制度就变得不适合继续下去，民主精神也就完全丧失了。鉴于名义保留而精神丧失，优点很小而缺陷很大，这些表现形式相互竞争，都给民主带来了耻辱，我相信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里讨论它们。

长期以来，民主在每一个国家都表现出明显的解体症状。不寻常的震惊，以及它的外观不再是以前的样子。

**议会制度失败的答案是:精英阶层**

我真正反对的不是民主的精神，而是民主的制度。民主的精神，在书王的一句话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宽子、墨子，无论他们是居、道、佛家的代表，还是其他学派的代表，都没有异样的思想。在这里，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

无论君主政体还是民主政体，独裁政体还是立宪政体，无论在中国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外，在一切拥有长期和平的明智领导的国家里，主要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人民身上。政府与人民同甘共苦，受到人民的尊重，与人民共同享有和平。

“民主”一词最初是用来区分多数人政府和少数人统治，后者属于专制主义和贵族统治。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等口号，显示了民主的真实历程。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口号是相当不切实际的。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中，被领导的是群众，领导者是少数。全民执政——这是一句空话。那些从多数中崛起的领袖，无论他们是贵族还是劳动者、财阀还是流浪汉、政治家还是政党领袖、牧师、平民还是军官，他们总是构成少数。如果我们要从不同的少数人领导的政府形式中挑选出最有用的，我们会选择贵族。正是这种政府形式符合“内圣”和“外治”的方式，称为chin-tzu(君子)或shih(師)(贵人，或师、师)在远东各派政治哲学中。

在老子中，我们发现这样一句话:“圣人使百姓之心为己心。”如果统治的少数人把被统治的多数人的愿望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符合这一点。因此，我认为可以对林肯的口号加以改进，我想把这些口号表述如下。

政府是以全体人民为基础的，是由从人民中间产生的少数人来管理的。政府力求为尽可能多的人谋福利。现在只需要澄清这少数人的性质。我愿意建议用“精英”一词来称呼它，并把它的政府形式称为“精英政府”。

**如何找到精英**

精英是由这个国家最杰出的人组成的。关于他们的能力，他们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有足够的教育程度，通过国家考试，并由职业团体选出。自古以来，学者和官员都必须通过这三项考试——入学、考试、选举。从三朝时代开始，学堂和选举(任命)交替流行。唐宋以后，考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这三者被同等地应用。因此，每个希望跻身精英行列的人都必须完成学业，通过考试，并达到其专业或行业的标准。由于普遍的教育水平，学校的水平可以逐渐提高，至少要高于中等学校的较低阶层。

每个希望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参加国家考试，这有点像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强调以下科目:中国历史和地理，世界历史和近代史，政治和法律基础。只有在他通过了这个考试之后，他才被认为是候选人。

他必须有稳定的职业和相应的收入，属于他的行业或专业协会，并由他们选出。

只有通过这三个条件证明自己有能力的人，才被赋予选举权或被选举权、提案权、投票权或废黜权。他们可以成为官员或国会议员。人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的建议，即对当选人的要求比对选举人的要求更高，对高级官员和代表的资格界线应该划得更明确。

综上所述: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通过这种选择的分数可能很小——没有必要很大。由此形成的精英阶层被告知有关新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所有意图，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同样地，他们也拥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政府事务的全部权力。这将代表少数政府的理想形式，同时也是多数政府的理想形式，因为少数人在其最终目标中代表了多数人的思想。与群众对建筑的建设有发言权的情况相比，这似乎是一个好得多的解决方案。与任何一种以贵族、劳工、财阀、流浪汉等阶级为基础的少数政府相比，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借助新民主主义所建立的职业立法和议会立法这两项新原则，选举制度，即人民的在基本改变代表制和议会制的情况下，民主精神得以保存，现行制度的缺陷得以彻底根除。因此，少数政府还是多数政府的问题，远东“人民为基础”的理念和西方“人民执政”的理念，经济社会主义和政治民主的问题，都必须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未来的新世界秩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建设，才能谈论人类的进步。到那时，各民族和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所作的牺牲才会得到报偿。

在反对西方影响所造成的危害时，我并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有改进的地方。

**家庭**

中国人的社会观念不同于西方人，主要在于家庭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重心。中国文化的成就和表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我想更进一步地断言，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上。一方面，个人独立发展的精神被家庭内部的联系所破坏。另一方面，为国家和民族进行共同斗争所需要的力量，又被家庭谋求自身利益的愿望所削弱。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哲学导致了一种文明的兴起，这种文明是以氏族为组织的社会为基础的，这种社会已经存在了五千年，从未动摇过。当然，在真正的结合和个人的孤立之间也有过一段时期——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这种情况本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然而，当有一天与外国列强发生接触时，这个文明看到自己被推向了世界斗争的竞技场存在，它的无力变得明显，它不再能够维持自己。

中国的家庭制度虽然发展得很早，但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缺陷。以前真正推动国家发展的制度，今天反而成了阻碍国家进步的力量，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然而，我相信，家庭的这种作用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从来没有被中国的伟大圣贤所打算过。仅仅说家庭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决定性因素，这绝不是结论性的。因为这种社会思想中也一直存在着个人主义倾向，以道家学派为代表;老子、庄子、杨初所教导的是个人主义。然后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趋势，以法学院为代表:韩非子和商鞅教授强国的原则。进一步有一个普遍主义的学派，以墨子(墨蒂)为代表，他的教义是包罗万象的爱。

孔子和孟子体现了历代的完美，是神圣教义传统的真正祖先。对他们来说，家庭结构不过是治国的一种手段。因此有这样的说法:“孝道必须服从于忠诚”;或“在有虔诚儿子的家里寻找忠诚的臣民。”这样，国家和民族就成为社会结构的中心。可以说，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代表，孔子和孟子并没有把家庭作为他们社会思想的中心。

**家庭，只是一部分**

中国的圣贤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个人的关系要如此社会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在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方法上存在着深远的差异。没有父亲和母亲，个人就不能存在;童年时，他和兄弟姐妹一起长大，成年后，他生活在婚姻状态中。因此，每个人都同时与父母、兄弟姐妹、丈夫或妻子有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众多的家庭形成了国家。家有什么父子、兄妹、夫妻，人口就有什么国家。从这些关系中产生了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现在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国家。不同的国家和人民之间不可能没有关系而存在。由此又产生了新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人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对世界都负有义务。如果这些不同关系所产生的义务和权利不发生冲突，并且都能平等地得到履行或考虑，那么一切都将是理想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重要的必须调整为不重要的，紧急的必须调整为不那么紧急的，人们常常必须决定哪个优先，哪个责任更大。那么，我们应该遵守的标准是什么呢?

**家庭的真正地位**

我建议用中国两个古老的概念“延伸”(t’ui推)和“从属”(yi移)作为行为准则。“外延”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自己本质上的一切，以模范的方式，延伸到别人身上。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年龄或青春延伸到别人身上，把对父亲和母亲的尊重延伸到统治者和国家，把对孩子的爱延伸到人民，把对兄弟姐妹的爱延伸到所有人身上。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延伸到家庭，从家庭中延伸出来向国家，从国家走向世界;从近到远的奋斗，就会接近远;从熟悉的向陌生的努力，陌生的就会变成熟悉的。虽然可能有区别，但没有一个是被忽视的，整个世界是一家，在四大洋里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因此，一个人可以真正地说，一个人可以把家庭作为一个中心出发点，但他不可以把自己局限于家庭。

“从属”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可以用上面引用的那句话来表达——“孝道必须从属于忠诚。”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实现，孝道就必须让位于爱国义务。这就等于为了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而放弃对家庭的义务，并论证了为大而舍小，使少数服从于多数，牺牲小的自我以维持和保护更大的自我的原则。如果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那么个人就必须服从于家庭;如果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那么为了国家，就必须把家庭凌驾于之上。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与全世界的利益相冲突，那么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这个国家就必须废除。因此，从共同体的角度思考的人，忘记了自己的自我;而从国家角度思考的人，忘记了家庭。这意味着占据中心地位的不再是家庭，而是国家。

如果这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宗族制度并不一定妨碍社会发展，中国的社会思想并不仅仅以家庭为中心点。即使假设中国的社会思想以家庭为中心点，那么，如果运用国家、民族、世界这两者，那么这种以国家、民族、世界为中心点的哲学也可以很容易地与之融合“延伸”和“从属”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在中国伦理中，个人原则一直被维护，个人被认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在《大典》的八个部分中，从个人出发，拟定了两个进展，——“心、思、知”指向内，“家、国、世界”指向外。因此，人们不应该说家庭，而应该说个人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中心。

**四大**

当今世界有四大“权力集团”，它们相互对立，形成鲜明对比。这四个集团的种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播下的。到现在的战争开始时，他们已经生根发芽，到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发展的最后阶段。

一种是英美集团，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他们的努力都是为了维护旧秩序。一个是德意集团，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秩序。苏联形成了另一个集团，即共产主义第三国际的阵营。最后是远东集团，即黄种人在生存斗争中的结合。它的战斗口号是“解放所有亚洲人民，争取所有亚洲国家的独立”。

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权力集团，正如它不可能孤立于现有的权力集团之外。它将不得不加入哪个集团呢考虑到历史、地理位置、种族赋予它的地位，文化等。这不是已经决定是什么?

**未来的目标**

中国未来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可以列举出三个最重要的目标。

第一步必须是赢得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我们必须摆脱白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摆脱半殖民地生存的枷锁，从奴隶身份回到主人的地位。我们必须在表面上要求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内部要求与我们自己权力集团的民族和国家享有平等。

第二步，必须是各民族和国家在各自权力集团内部的互助和善意、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外交和军事上的联盟以及有关文化之间的接触的基础上的联合。集团内的个人必须像兄弟姐妹一样同甘共苦，必须形成一个像身体和肢体一样的单位。

第三步应该是诱导整个世界克服物质和文化专制的时代。全人类都要践行道家和平与和谐的教义，唤醒佛教慈悲与救赎的思想，践行儒家“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论。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必须承担的责任，比本集团内其他民族的责任更重。